

蔡景康文集

卷二

力耘軒散文詩詞

卷二

新加坡文艺协会

蔡景康文集

卷二

力耘轩散文诗词

新加坡文艺协会

蔡景康文集
卷二
力耘轩散文诗词

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15N LIM TUA TOW ROAD
SINGAPORE 547751
TEL/FAX:62804630
2008年5月初版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9.875
插页:2 张
字数:237 千字
ISBN 978 - 981 - 08 - 0440 - 4
定价:(新币) \$ 15 元
(人民币)25 元

蔡景康文集序

日月丽天，山川形地；两间英灵，一身正气。浩然充于德行，淳若风清；焕然化为文章，绚如霞蔚。昔贤求立，所期不朽有三；斯人作成，乃得长垂其二。因德成性，自能直道而行；出言为文，必也曲尽其意。或谓古今文人，不护细行；然而坦荡君子，永怀大志。犹楩楠之茂盛，必固本根；故文苑之光华，乃出德器。至圣有言，志于道依于仁；唐贤亦云，先器识后文艺。今观景康之经纬文德也，其乃古人之所谓修平风致。

不有疾风，何以能知劲草；若无大雪，何以得识贞松。处于动荡之时，方显本色；葆其清正之质，自见芳容。斯人之生世也，波诡云谲；斯人之为道也，水净山崇。无阿私之奴颜，常耻媚态；有特立之人格，独抱素衷。生憎百辟贪婪，疾恶如仇；常系万家忧乐，克己奉公。交友朋以诚真，披肝沥胆；怀家眷而情笃，善始令终。朋俦相赞，引为管鲍之交；门生景仰，雅有孔颜之风。树李栽桃，执木铎以乐育；科研教学，事翰墨而允恭。以砚为田，勤耕种而力耘；以道为心，排杂念以虚冲。今观景康之师范表率也，其乃古人之所谓清明在躬。

动则成德，有德者必言立；言则成文，善文者其德芳。弸中彪外，其情见乎辞采；文成质见，似玉焕然辉光。斯人之立德也，如圭似镜；斯人之为文也，锦心绣肠。其所潜心，在于文学古典；其所著述，登于文论殿堂。盖因稗官，古人以为小道；是

以说部，作者亦未丕扬。近代世变，文学内涵胥改；当今学术，正统观念更张。评注小说，虽多士所染指；研讨点批，乃学界之拓荒。研究评批理论，著文宏富；贡献学术成果，业绩焜煌。其于世情万象，涉笔成趣；每有感怀一悟，落墨淋浪。苟有裨益世道，毋须长论；但能启迪民心，何妨短章。讽喻世态，常托意于诗刺；寄情山水，聊自娱以神骧。逸兴高怀，每吟哦以抒发；澄怀壮志，亦慷慨而激昂。风骚继响，续以清辞丽句；江山相助，温如春煦秋阳。今观景康之诗文论著也，其乃古人之所谓奥府秘藏。

人生在世，百年有时而尽；盛事斯文，千古不朽以传。哲人其萎，学界深痛殒绿；华章结集，家人为裒散篇。其为名也，曰蔡景康文集；其为体也，以诗文论合编。行将付刊，欲垂世以扬也；于以命序，乃缀句而撰焉。是为序。

戊子梅月京华清风馆 林东海

目 录

蔡景康文集序 林东海 (1)

散文

隔海两小镇	(1)
堂叔公轶事	(3)
旅港偶拾	(7)
习惯的力度——“旅港偶拾”之二	(10)
假货——旅港偶拾之三	(14)
过港脞谈	(17)
初访悉尼大学	(19)
捕捉时差的奇景 旅澳游思之一	(23)
我少过了一个冬天 旅澳游思之二	(26)
悉尼街名拾趣 旅澳游思之三	(28)
悉尼大学：古老建筑与现代科学的融合	(31)
难忘那澳洲之一 联邦式的建筑	(34)
难忘那澳洲之二 卡雅玛的浪花洞和落日	(36)
海外经营奇招妙着	(38)
多元文化与澳洲商贸的繁荣	(41)
在澳大利亚度假	(44)
妙趣横生的异国墓志铭	(45)

澳洲老人的“富贵病”	(47)
孙子的“新闻报告日”	(49)
到占勃洛(Jamboroo)度假——《旅澳游思》之四	(51)
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会大厦	(55)
虞愚先生二三事	(58)
师范永恒——怀念郑朝宗先生	(61)
“不以隐约而弗务”——纪念黄典诚先生逝世十周年	(65)
忆“何老”	(68)
忆人志——写在人志去世一周年	(71)
追思——悼念欧阳威荣同志	(74)
十年回顾——在庆祝养正中学厦门校友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76)
《校友通讯》四十期	(83)
养正杂忆	(86)
慕贤游侨乡 意气更泱泱——记致公党厦大文科支部的一次活动	(89)
《晋江歌谣》前言	(92)
晋江东石的三公宫	(97)
《东石民间传说》序	(99)
《东石港史研究》序	(102)
《晋江与台湾文化民俗信仰》序三	(104)
《晋江历代文选》自序	(106)
《力耘轩诗集》自序	(109)
《力耘轩诗词二集》序	(110)
岁月留痕	(112)
张瑞初《中国古代文粹选读》序	(115)
老凤声清越——《苏天嘉先生诗集》读后感	(117)
鲁迅在厦门大学	(126)

目 录

宝贵的启示——读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札记	(130)
琐谈出人意外之笔	(133)
“身经目睹”一议——读脂砚斋的一段评语	(135)
“晋江精神”和晋江历史文化研究	(138)
《西山杂志》种种	(144)
论石鼓庙宗教信仰文化内涵及其他	(147)
历史的神化——试论清水祖师信仰的地方色彩	(157)
专家学者答故乡问	(162)

诗词

力耘轩诗集	(164)
力耘轩诗词二集	(210)

附录

纪念蔡景康先生专辑	(263)
我的话（代后记）	王碧月 (301)

隔海两小镇

(散文)

我的家乡东石，是一个极普通的小集镇。一幢幢的房子，按照一字形的图案，毫不引人注目地陈列在海边。但它时常招惹我儿时的许多诗情画意的怀念，也时时拨动我对亲人深沉怀念的心弦……。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要算是我们家前面的那个“天然乐园”了。这是一个不到一百见方的开阔地，它的前边，则是一个不大的船坞。我们小时的夏夜，几乎全都在此度过。

每年中秋前后，船坞就一定停泊着一条从台湾开来的货船，船舱里尽是诱人的香蕉和菠萝，船上那个矮墩墩的水手，常向我们招手，要我们上船。先用海水洗净手脚，然后就给我们台湾香蕉和菠萝吃，随后，才让我们一个个紧挨他躺在甲板上，听他讲着无数神奇的故事。可惜因年月久了，那些故事我都忘了，然而他在开讲故事之前的那段固定不变的开场白，却一直深深地镂刻在我的心灵中：“……我也是东石人。台湾的东石是从这里的东石蕃衍过去的……”

台湾那边确有个地方也叫东石，这在我中学时代上地理课就知道了。可是，台湾的东石是从我们东石蕃衍过去的，却是后来我从前辈那里和谱牒的记载里才得知的。原来，由于我们东石地处滨海，航行便利，明代嘉靖年间，从我们家乡东渡移居台湾的人逐渐增加。我们四世祖中的蔡显聚、蔡显宾、蔡显仁等，也随

人东渡台湾，他们勤劳开发，并在那里定居，后来子孙繁茂，在那里建立东石、布袋嘴、桥仔头等三个村庄。为了使后代不忘祖先业绩，在我们的七世祖蔡惟宪的倡议下，在家乡建祠堂、树墓碑、记谱牒，取名玉井房族，并于每年冬至那一天，举行“祭冬”仪式，台湾那边的同胞族人，每年均派人回来欢聚，共同拜祭祖先。这一习俗，一直保持到解放以后，只不过，台湾那边的我们同胞族人，虽然渴望回来团聚和祭祖，但三十多年来却始终未能如愿。那个矮墩墩的水手，也确实是我同宗的族人。由于水手职业上的方便，每年除中秋节回来团圆以外，元宵节也常来家乡，参加数宫灯的欢聚活动的。数宫灯，这是家乡的习俗。每年元宵佳节，凡是在这年新婚的青年，都必须在那天夜幕降临的时刻，从家里出发，手提一对花样新巧的宫灯，挂到乡里“三公宫”里去。从正月十五晚开始，持续三个夜晚，男女老少齐集宫庙里，尽情欣赏那五彩缤纷、争奇斗妍的宫灯；或猜灯谜，或听南曲清唱，大人们还数着这一年宫灯的对数；算一算今年比去年增加了多少……，我们族人在台湾的布袋嘴，也仿照故乡的习俗，不但仿建一座“三公宫”的寺庙，每逢元宵在宫内提挂宫灯，而且还有一大批族人回来共度佳节，通报该年在台湾的宫灯对数，并把家乡宫灯的数字带回去，以互报闽、台两地子孙发展的情况。记得解放前夕那一次元宵节，那位熟悉的水手也来了，他到宫内，一定要先绕一圈，数着宫灯的对数，生怕数错，总是来回二、三次才罢。

从那年元宵节以后，一晃三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那时的天然乐园，至今犹在，在中秋的夜晚，家乡的小孩是否还玩“烧塔仔”？船坞那里新建了一个码头，随时等候台湾同胞亲人的船只前来停泊；那三公宫的寺庙如今也还在，这三十多年来，那矮墩墩的水手和同胞亲人，一定和我一样，老盼望着：何日共元宵？盘算着：宫灯今多少？

《福建日报》1981. 05. 06（收入《厦门特区优秀作品选》）

堂叔公轶事

我在香港的亲朋戚友，以经商者居多，在学界做事的，寥寥无几。这自然是经商赚钱容易而学界则生活清贫的缘故。故乡地少人多，解放前兵匪频仍，无以谋生，是以祖辈中许多人只好离井背乡飘洋过海去做“番客”。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港客”也渐渐多了起来。“港客”和“番客”有何不同，我没去深究，我只知道无论是“番客”还是“港客”，为的都是想多挣点钱，让自己和家里的人生活过得好些。小时，前辈们经常有人从“番邦”回来，没有出过洋的人自然都很好奇，每当“番客”回乡，就有许多人围拢过来，问这问那，而“番客”们也绘声绘色地讲述“番邦”那些奇特而陌生的风土人情；有些事业成功的“番客”，则兴致勃勃地叙述他们发财的故事。叙述者津津有味，听讲者更是饶有兴味，所以，常常直至夜阑方散。

可惜事过境迁，那些色彩缤纷的故事，大多被流驶的时光，冲刷得一干二净了。现在唯一还有点影子的，是关于我的一个在马来西亚的堂叔公的事。

堂叔公是我们家族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听老一辈的人说，远在二十年代末，他就身穿背心短裤，手提一袋地瓜干，脚着一双木屐到马来西亚的吉灵丹去，先是在橡胶园里做“苦力”，过了几年的功夫，开始经营米店，又过了几年，居然就“发”了起来，成为我们村子屈指可数的一个资格老、又发财的

“大番客”。

他之所以最受尊敬，并不仅仅是他发了财，直到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关于他的二三件使我倾倒的事。一件是四十年代中，家乡鼠疫肆虐，短时间内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在我的同族中，就有全家死于鼠疫者，抑或一家幸存一二鳏寡老人者，凄风苦雨笼罩全村，其状惨不忍睹。那时，中国和东南亚一带还处于日寇占领之下，交通断绝，可是我的堂叔公却能辗转从南洋寄回一批药品，使家乡的许多人免于罹难。事后，家族中有人动议，要为堂叔公立一石碑，以为纪念。但堂叔公说什么也不肯，这件事使我十分敬佩。第二件是家乡地少人多，人们无以谋生，生活拮据，为使堂亲们觅一出路，他曾经无偿地、不论亲疏地提携了二十多位堂亲到南洋去，这些人后来也都事有所成，至今许多人还念及他的恩德。第三件则是我们家乡的小学，一直由他独资支持，直到他过世。还记得在一次我们小学的一个庆典上，他曾经作过简短训话，大意是说他希望学生勤奋读书，将来发财，不要做官，因为做官压迫人，而发财则可帮助乡亲过好生活。他说这话时那滑稽的比划手势和略带沙哑的声音，至今音容宛在。

这些事，使堂叔公在我脑海中建立起一座丰碑，尤其是幼年时代，他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我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出洋，也能像堂叔公一样发大财，但我要办更多的事，诸如盖一所大医院、办一所中学、修一条大路等等。后来，幻想终归幻想，自己终究没发财，于是心里总觉得有负堂叔公的厚望似的。

然而，渐渐地有些风言风语，使我长留脑海的完美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对堂叔公的为人开始有点疑窦。

比方说，五十年代初，一位得到他提携的堂伯父从马来西亚回来，对堂叔公自然赞扬备至，他说堂叔公在南洋开米店，很会经营。例如在南洋买卖米粮，和当时国内一样，都是用一种竹制的量器量的，俗称“米管”，每次“番仔”来买米，堂叔公就用

“米管”的底部量米，把量器的米量得高高的，量完后还随手添上一把，“番仔”不知受骗，还很高兴，天天来向他买米，还说他“童叟无欺”，十分诚实。所以生意十分兴隆。

堂伯父讲述这一趣事，自然是赞扬堂叔公十分善于经营，那时的我，心里也是这样想。但后来待我逐渐懂事，想起这一细节，心中不免有些疑惑。我想，虽然受骗的是“番仔”，但毕竟这是一种欺诈手段，“童叟无欺”的堂叔公，终究还是有欺，也许，这是他发财的奥秘之一吧。

还有一件事，虽非堂叔公本人所为，但总觉得与他不无干系。他的长孙叫精诚，与我是同班同学，打从幼年时候起，堂亲们就一直很称赞他，说他样样像堂叔公，将来必定十分出息，我和他也从小雅相厚善，十分相得。小学毕业后，我们一道进入邻近的一所有名的中学读书，那年头全国正兴除灭四害。每当课余，我俩的衣袋里总是装满火柴盒，沿街打苍蝇，然后把死苍蝇装入火柴盒交了上去。然而，使我十分奇怪和气愤的是，每次打苍蝇我都打得比他多得多，可每次老师总是表扬他，说他打的苍蝇数量全班第一。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一道步行回家，路上，我就问他，为什么我打的苍蝇比你多得多，而老师表扬的却是你？

他听我这一问，竟哈哈大笑起来，随后诡秘地对我说：“火柴盒里装沙土，再在上面盖上一层死苍蝇，一盒不就可以变成好多盒？”说这话时，他那眼里，闪烁着一种狡黠的青光。不知怎地，那时我突然联想到堂叔公用“米管”底部量米骗人的事来，难怪堂亲们一直赞扬我的堂哥，说他样样都象堂叔公。从那以后，我虽然感叹他手段的巧妙和本领的高超，但对于他的人品，却很有些鄙夷，而堂叔公的完美形象，也再一次抹上一层阴暗的色彩。

流驶的时光，悄悄地带走四十几个春秋，到今年我在香港与

堂哥见面时，他已是一位大腹便便的大亨了。那天，他特地在阔绰的伊丽莎白大酒店宴请我，许多菜肴都是我平生未曾见及的，我特地指着一头硕大无比，据说是美国阿拉斯加“峙”说：“那‘峙’身的形状，就象你！”他对我的嘲弄并不生气，还是哈哈大笑，眼里依然闪烁狡黠的青光。

我们相互戏谑着，我又重提幼时打苍蝇的往事，并说：“我如果有你这一手，现在不也是大亨了？”

“不！你会是一名鼎鼎有名的大学者。”他的语调显得十分坚决。

我有点气愤，像受到很大侮辱，气鼓鼓地说：“别把尔虞我诈的商界跟我们学界扯在一起！”他不客气地截断我的话：“是啊！我们学界是何等崇高、何等质朴、何等圣洁……得了，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在你们学界难道还少？就你死心眼。难怪……”他没往下说，我也没再驳难，两人相对默然，陷入沉思。

回到住处，壁上挂钟的时针正停在深夜二时。我没一丝睡意，点燃一支香烟，随着袅袅飘动的烟雾向窗外望去，只见鳞次栉比的大厦，依旧是万家灯火，眼底下那条通往英皇大道的路，照样笔直地伸展着。咀嚼堂兄的那些话，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似乎都有，但“死心眼”是无法改变的，我还信古人所讲的“道德文章”这一条。

只是多次问过自己：我们学界什么时候变得不圣洁的？

《福建文学》1995年第二期
《散文》海外版1995，第三期转载

旅港偶拾

今年到香港探亲，正赶上过农历年。熙熙攘攘的购买年货衣物的人流，给这个弹丸之岛带来了浓烈的节日气氛，而挂满商店、公寓的节日装饰和家家户户忙碌准备的“红包”，也为年关的香港，染上它特有的喜庆色彩。

中国人喜欢用红色表示吉祥，结婚如此，祝寿也如此。就连家里死了人，也仍然忘不了要在家门口和运尸体的汽车上，挂上一条红布条。香港人也不例外，依旧保留这老传统，过年时贴上一对红对联，挂上红灯笼，或在窗格上粘上红色的精美图案……。只是，我在香港所见到的，无论对联还是其他节日饰品，则无一不与“财”字相关。诸如“八路进宝，四方来财”啦，“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大大小小的红灯笼，自然忘不了书上“财运亨通”四字，更有一种图案，是按古钱币的形状做成的，虽是平面，远看却如灯笼，中留方孔，四边对称地写上“恭喜发财”四字。新年伊始拜年的第一句话，也总是“恭喜发财”。在这样氛围下过年，真令人有若坠入“钱海”之感。

“钱”，或者说“财”，确实成为香港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我的亲朋戚友常说：“香港人最现实。”意谓在香港这样的地方，谁“财大”，谁“气”就粗，不管黑猫白猫，谁的钱多，谁的地位就高。就说“压岁钱”吧，过新年时，香港人都得准

备好为数不少的“红包”；从商店买来印有“恭喜发财”的精制的“红包”袋，袋里则分别塞入十元、二十元、四十元的港币，一到新年，凡遇未成家的孩子照例分发。我曾经好奇而仔细地观察过，这数量不等的红包，是怎样分发给不等的人的，也从我的外孙所得“红包”的数量，去推断那人的经济地位。结果基本吻合。谁给的“红包”钱多，谁的身份和地位就高，当然有钱而吝啬者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除外。正月的一天，一位老同学在豪华的维多利亚酒楼宴请我，女儿怕我认不得路，带着外孙送我。一见面，我的老同学就塞给外孙一个“红包”，后来听外孙说，内装二百元，这数字自然令我咋舌，但却与我同学的经济地位相称，他在香港经营规模不小的贸易公司，二十多年来赚了不少钱，在我众多旅港的老同学中，算是“最发”的一位。

当然，老同学中并非个个都能如此。

香港有一种人们所熟知的职业，叫做“看大楼”，实即公寓大楼的保安员。保安员一般由年龄较大的人担任。女儿住的公寓，属鲗鱼涌区新建的建筑群，设计新颖，结构合理，公用设施也十分之好，前有网球场、游泳池，后有铺设软地板、设有色彩缤纷、名色繁多器材的儿童游乐场，住在这里大多属中等以上人家。公寓保安员通过楼下保安室中的闭路电视，观察进进出出的人们以及电梯里的情况，保卫居民的安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一个保安员各自认出了对方，原来竟是初中的老同学，由孩提的当年到现在都已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不免感慨万千，相对吁唏！香港人最忌别人问他每月赚多少钱，因为是数十年未见的老同学，所以我也就直言问问他月薪多少？他倒也坦率，说每月月薪四千港元。然而，紧接着，他却告诉我，他好几个孩子或开表壳厂，或开制衣厂，或经营贸易公司等等，都要他在家养老等等。俗云“锣鼓听声，听话听音”，言外之意，无非是告诉我，照他的家境，是不必再来看大楼的。我自然不便再说什么，只是

心里纳闷，四千港币大约等于三千人民币，在大陆就相当于十个像我这样的副教授月收入，何以他仍感到社会地位的低微？女儿说，在香港，这样的月薪确属一般下层工人收入的水平。女儿的证实，使我再次确信：香港这种地方，钱之多少，与人们的社会地位成正比。几十年前学过政治经济学，尽管那些知识已大部分归还老师，但至今似乎还记得：钱即货币并不是资本，但当货币转化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时，就体现着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香港人以此作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价值尺度，固不足奇，在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也不应如此。然而，联想到最近在《福建文学》读到的闻达的《在青菜五毛钱一斤的街上》⁽¹⁾，不免感慨良多，心想，“要加盖一个带五角星的圆印才能领到六斤青菜一首诗”的现实若不改变，确会使我们那些精神文明建设者们“像一条刚刚出壳的蛇，猥琐且惘然地看着变幻的世界。”⁽²⁾这也许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关键问题之一吧。

注：(1)、(2)：见《福建文学》1991年第四期

《厦门日报》1991. 07. 24